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张玲/著

变奏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



变奏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1)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序

周尚文

成立于1919年的共产国际是俄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控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个支部，这从组织上保证共产国际各项决议的贯彻执行和各国党重要领导成员的去留奖惩。它从成立的一天起，就是按照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原则开展活动的。初期由于各国革命激情高涨，欧美先进国家工人运动活跃，加上列宁亲自加以指导，使共产国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落后国家建立共产党、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这个组织一开始就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建立共产国际的目的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当时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出现了一些危机和动荡，但还谈不上资本主义末日已经来临，试图通过世界革命很快在地球上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打算，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二是共产国际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和集权，不可避免地使各国党丧失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可能性，窒息了各国党的创造精神。其中第一个缺陷不久就被形势发展所破灭，列宁和共产国际期望的世界革命高潮没有到来，而是进入了“一球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对立和对峙时期。虽然共产国际始终没有放下世界革命这面旗帜，但毕竟不能不面对严酷的现实。第二个缺陷在列宁时期还不太明显，可是在斯大林当政后，就将这一缺陷推向极致，苏共将共产国际变为推行本国政策、谋求本国利益的工具，直接插手和指挥各国革命，莫斯科既不了解实情，又发号施令，乱加指挥，不但使各国共产党陷于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而且常常使各个国家的革命事业遭受损害。更有甚者，如果各国党内有人稍有“独立”倾向，就被视为忤逆，立即采取组织措施，严加惩治。这一点，在中国革命的前期表现十分明显，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也特别严重。

张玲的著作——《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

一书,以翔实的史料、深邃的思考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以梳理,澄清了一些过去模糊不清的历史悬案的真实面目,并通过大量的史实和分析,揭示了“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过去我们党曾经把这一时期的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认为是当时党的领导人不能正确领会和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造成的。现在看来,这样的结论既不公平,情况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在那个年代,联共〔布〕党内、共产国际内部以及中国共产党内围绕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转化为中国党内中央与苏区之间、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与中国党的各级领导人之间、中共党内各派力量之间的恩恩怨怨。只有通过认真的梳理,才能比较清晰地呈现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复杂场面。现在看来,共产国际这种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斯大林和联共〔布〕那种气指颐使的言行,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是无力抵抗的,何况,中国党内也不是铁板一块,既有像陈独秀那样进行一定程度的抵制和抗争而遭到贬斥的,也有像王明那样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拉虎皮作大旗的。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既了解国情,又不怕压、不畏难、不屈不挠开辟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者,终于在经历艰难曲折的斗争之后,最终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桎梏,形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今天,我们离开那段历史已有70多年了。研究这段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以下两点:第一,革命也好,建设也好,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不能照搬照抄任何别的模式,不能盲目听信和听从任何“权威”的指令。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否则,吃亏的只能是自己。这一点,已经成了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二,必须充分认识“左”的思想和路线的严重危害。从张玲的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革命失败的转折关头,在创建红色根据地的艰难岁月,在围剿反围剿的无数次生死搏斗中,共产国际发来了许许多多的“指示”,充斥着“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种种表现,诸如盲目强调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主张无节制的“进攻”策略,推行“百分之

百的布尔什维克化”，主张革命队伍“纯而又纯”，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毫无根据地搜索敌人，制造了一起起令人发指的冤假错案，等等，等等。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一直把社会民主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联共〔布〕党内正在开展的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通过共产国际无例外地推广到各国党开展同样的斗争，也深刻而又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仅此一例，说明“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多么严重的劫难！这使我想起邓小平 1992 年视察南方时讲的一段话，他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5 页〕这段话蕴含着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也许是张玲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理论学术界迎来思想解放的春天。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传来上级的一条信息：共产国际问题已经不再属于学术禁区，学界可以进行研究。这个消息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困于教条束缚、独立思考能力缺失的国际共运、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者而言，不啻是个有力的推进。于是，一个时期里，在相关的学术领域，围绕共产国际研究的著作、论文纷纷发表，一派生机盎然。当时的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从共产国际本身的兴衰得失研究其历史经验教训；二是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寻找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可是，一阵热潮过后，研究者骤然减少，研究生围绕这一选题的学位论文也很少见了。究其原因，一是作为历史问题的研究，毕竟已相隔近半个世纪，时代主题已从革命转换为经济建设，现实针对性有所减弱；二是表层的研究已告一段落，要深入研究需要具有更完备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文献档案的发掘和整理〕和更加艰苦的梳理分析和理论研究，而这些条件一时难以具备。苏联的解体使一大批共产国际的档案解密，中国各个革命时期的史料也陆续披露，中共党史研究也有很多新进展，为研究者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提供相当有利的条件，如今唯一要有人沉下去，仔细地不务虚名地潜心研究。张玲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1999 年又来我校攻读国际共运专业博士学位，使她有条件更好地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课

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

题。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她在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任务之余,又搜集、整理、思考、研究了这一时段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两者关系诸多重大问题,使这本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量。对张玲这种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是为序。

2007年夏于华东师大一村寓所

前 言

共产国际与中国现代史(含中国革命史)紧紧地扭结在一起,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和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影响。

1919年,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诞生了,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世界革命为目标,领导世界各国工人党(共产党)进行了长达24年的革命运动,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它奏响了一首强劲的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交响乐,重重地涤荡了资本主义世界,唤醒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意识,一度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后历时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与共产国际及(俄)联共(布)结下了“不解之缘”。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成为其下属支部,根据共产国际“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总是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俄共(布)领导的十月革命,为求民族独立、争取民主权利、寻求国家新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可资学习的榜样,相似的国情,使双方都有理由坚信走十月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胜的必由之道。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并非双方想象得那样简单。以世界革命为终极目标的共产国际及在共产国际中充当实际领导者的(俄)联共(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世界革命(包括中国革命)及其性质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量,进而共产国际和(俄)联共(布)双方陆续派代表来华,首先在高校知识分子中进行社会调查、广泛宣传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鼓励他们转变世界观,走入下层群众,发动工人阶级进行社会革命,唤醒其阶级意识,接着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并锻造了大批骨干力量。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及(俄)联共(布)处于主动地位,并可驾驭国共合作的整体局势。但合作却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思路进行,频频出现不和谐音符,最终事与愿违,国共合作破裂。在此过程中还夹杂着联共(布)中央的权力角逐,斯大林作为“胜出者”逐渐独霸中国革命的话语

权,他提出了曾经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三阶段论”,随之导致中国革命征程中的三次“左”倾错误。

在之后进行的长征大转移中,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短暂地失去了联系,中央红军在陕西安顿之后,双方又恢复了关系。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直接决策下,和平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战场的中流砥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力,壮大了群众基础,这些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直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独立自主思考并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之时,共产国际才给予指导性的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形势日趋多样,需要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独立处理各自的革命事务,尤其是西欧诸国的工人党(共产党)对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日益不满,共产国际于1943年主动解散。这样,这个成立于1919年的国际组织,退出了历史舞台。

共产国际在24载历程中对中国革命既有贡献也有失误,功与过交织在一起演绎着不断变幻的革命乐章:其间夹杂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既有联共(布)中央内部不同意见分歧导致的权力争斗,又有中国共产党内部各种矛盾关系中的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组成了跌宕起伏的交响乐,其中既有和谐乐章,又有不甚悦耳的变奏曲。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26~1935年间是一段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基于上述因素,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判断虽然不乏有正确之处,但由于遥控指挥及对中国国情理解的偏差,它制定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错误层出,连续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这段时期,不太和谐的变奏曲是主旋律。

本书力图以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1993年俄罗斯相继解密一批档案资料,由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教研部翻译并两次出版发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1997~1998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7~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对中国革命影响作一番梳理,尤其对“一次右倾”、“三次左倾”错误的时代背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组织结构及其决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及

对共产国际政策的执行结果,进行理性分析,对陈独秀时期的右倾错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时期的“左”倾错误的主客观责任给予重新评价,深入剖析每个领导人的个性品质及领导集团的独特之处,较细致地反映当时党内、共产国际的政治生态,使联共(布)—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立体图景清晰地展现出来,从而找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受挫的内在根源。

本书由六部分内容组成:

绪论叙述了研究的范围(1926年3月~1935年1月)及依据;研究的发展沿革及现状;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第一章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内在关联。1926年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及处理方式,标志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强烈;北伐战争中,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及打击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刻意维护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等新右派采取退让政策;压制中共领导人的不同意见,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铸成,从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章探讨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受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指导,瞿秋白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探讨共产国际组织路线对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20年代末,联共(布)中央发动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并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推行。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在“打击中间势力”,追求“笔直又笔直”,队伍“纯而又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等方面,给中国革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四章探寻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在中国影响。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缘起及逐步僵化,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贯彻布尔什维克化方针过程中的失误及后果,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作了客观的评价。

第五章探讨1926~1935年中共“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和领导方式是中国革命受挫的主要原因,但并不否认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不成熟时期中共某些领导人本身的幼稚及传统文化影响是多次犯错的主观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久而艰难的历程,实现两者结合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

本书不仅涉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指导世界革命的政策,还着重研究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作出的相应政策,该政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带来

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并深入探讨隐含在这些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借助新解密档案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重要会议,及它们与中国共产党往来的信件、指示、报告,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次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错误在学理上细致地分析,澄清历史模糊之处及历史疑点,尽量还历史本来面目。“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虽然不能重演,但历史留下的教训可以为以后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源;“前车之鉴,后世之师”,防止重蹈覆辙。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历程亦可说明,避免历史错误不致重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书丰富的档案资料 and 比较细致的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如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如何选择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到底有何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联共(布)中央怎样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进行了哪些工作,又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犯错误的内在动因何在?本书都可提供翔实的资料佐证。

本书梳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三者关系的发展脉络,再现当时的革命立体图景,有理有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从事近现代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提供相关资料,也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这一重要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目 录

绪论	1
一、研究时限的界定	1
二、研究的缘起	20
三、研究的价值	23
第一章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25
一、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共成为民主联合阵线的附庸	27
二、联共阵线沦为联共(布)中央权力斗争的工具	45
三、共产国际在被动中放弃联合阵线	64
第二章 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与中共“左”倾错误	68
一、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是中共进攻理论的来源	69
二、“进攻理论”导致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77
三、“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共的“左”倾错误	85
第三章 共产国际“孤立中间势力”政策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	119
一、联共(布)的“左”倾及对共产国际的影响	119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	124
第四章 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对中共的影响	148
一、“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的提出及演变	148
二、“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对中共的影响	152
三、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再评价	176

第五章 革命和谐乐章之探源	181
一、没能理顺中国革命与国际主义、苏联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是中国共产党错误频频的关键因素	182
二、不成熟时期党的领导人“只唯上”“不唯实”，是不容忽视的主观 原因	197
三、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207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212

一、研究时限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离不开共产国际及俄(联)共(布)^①的指导。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1943年6月解散,历时近四分之一世纪。它作为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中心,领导了20世纪前半期风云变幻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战略策略和方针路线,尤其是关于东方民族和殖民地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俄(联)共(布)所控制的共产国际,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矛盾丛生的利益冲突中,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诸多错误。

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论述过。毛泽东总的评价曰:两头好,中间差。他在1944年4月20日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总结道: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可能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其改成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们也需要他们。毛泽东此时对共产国际的评价比较谨慎,因为中国革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尚需苏联的帮助,加之毛泽东本人对共产国际的反感不是非常强烈。^①他在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我们党在北伐时期是比较活泼的,有五万多党员,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革命失败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毛泽东还对这三次“左”倾错误性质及错误程度分别进行了评价: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②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评价,于1960年7月14~1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他把共产国际划为三个时期,即共产国际的初期(1919年3月~1927年7月),共产国际的中期(1927年7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的后期(1935年~1943年),并对三个时期的政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给予评述: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能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中国党的领导应负更多的责任;在共产国际的中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共产国际七大后,“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但比共产国际初期和中期对我们党的干涉都要少。^③周恩来对共产国际中期的缺点和错误着墨较多,指出其根本错误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

① 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赏识毛泽东、朱德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并给予高度评价。参见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误发毛泽东的讣告,《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文化报》2004年11月24日;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文集》(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1页。

③ 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15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305、311页。

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①他还对该时期中共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进行细致的剖析,指出在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失误应负更多责任。周恩来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分析基本符合历史史实,他此时承担着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历史的见证人。

周恩来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发展功过的评价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学界研究共产国际总的指导方针。即把自大革命失败至共产国际七大正式确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看作共产国际逐步走向教条化、干涉别国事务、对中国革命损害最大的时期。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界对这种划分方法进一步细化,展现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差别。

有学者把1923~1933年作为共产国际的中期。主要依据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认为从1923年6月召开的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起,共产国际逐渐抛弃三大、四大所确立的正确策略,转向“左”倾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策略。1928年召开的六大及1929年的执委会第十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标志着这次转折的最终完成和“左”倾路线的全面推行。这一策略路线一直延续到1933年第十三次全会。共产国际七大后进入后期。^②

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中期“左”倾政策形成的上限,应该从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的策略转变算起。三大虽然提出统一战线策略,但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和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高估世界革命形势,并做出“左”倾冒险的策略。共产国际对形势的看法前后矛盾,就在于共产国际的立足点还没有完全离开世界革命的策略。^③

有的学者根本不同意有“共产国际中期”的提法。其主要观点是:划分共产国际的分期,应该看有无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和核心人物。共产国际早期有列宁这个核心人物,指导思想是世界革命理论;后期有季米特洛夫,指导思想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中间的那段时期,领导者更换频繁,联共(布)中央内部的斗争也最为激烈和复杂,各领导人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应避免使用“共产国际中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② 周尚文等《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三次策略转折》,宋洪训、张中云主编:《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纪念共产国际成立70周年学术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17页。

③ 孟金生:《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策略的形成及其后果》,宋洪训、张中云主编:《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纪念共产国际成立70周年学术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17页。

期”这个概念。^①

之所以造成上述的观点分歧,主要是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学者们对共产国际分期的依据是共产国际策略的演化,而周恩来的划分标准是从总体上、概括性地回顾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着重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探讨共产国际中期的错误策略和中共三次“左”倾错误之间的关系。他的划分标准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是对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的“两头好,中间差”进一步阐释,从大方向上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走过的历程。当时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增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力量,共同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及纠正“左”倾冒进,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共产国际本身的分期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分期,两者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鉴于本书探讨的重点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主要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分期为主要依据。即前期为1919~1927年,中期为1927~1935年,后期为1935~1943年。

从共产国际的整体看,共经历四次大的策略转变,第一次是以列宁为核心的世界革命时期(1919~1921年),第二次是统一战线时期(1921~1923),第三次为非统一战线时期(1924~1933),第四次为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时期(1933~1943)。

对中国革命而言,共产国际政策逐步走向教条并与苏联的外交利益关联,集中体现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至1935年的遵义会议召开前夕这段时期。中山舰事件之前,共产国际基本能够贯彻其世界革命理论的策略,在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内容的民主联合战线,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遵义会议之后,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局面;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实现了战略转变,领导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较少干涉中国共产党事务,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胜利有了政治保证。双方的互动,奏出比较和谐的音符。而中间这段时期,随着共产国际领导体制的日益集权,压制中国共产党的主动性、创造性,打击不同意见;把十月革命经验教条化,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强制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共产国际由“世界共产党”组织逐步沦为苏

^① 这是笔者访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玉贞时,他们所持的观点。

联对外政策的工具。更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处于不成熟期,不具备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原因,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消极成分居多。因此,它成为整个乐章中的特殊一节——充满杂乱音符的变奏曲。

简单回顾中山舰事件之前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及对中国革命影响的发展脉络,能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及 1926~1935 年间中共所犯错误的根源看得更清楚。

共产国际的主要创始人列宁最初把共产国际设计为实现“世界革命”的组织载体。列宁对世界革命的探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初步形成理论体系。他认为世界革命包括三种类型,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发生在无产阶级比较众多和集中的地方,如能得到西欧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援助,将能不间断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革命,由于缺少无产阶级,特殊的长期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对三种革命之间的关系,列宁也作了分析:世界革命的根本动力仍然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俄国革命是否能彻底进行到底,东方革命一旦出现无产阶级能否转入社会主义,都取决于经验丰富的西欧无产阶级的指导。他在写《四月提纲》前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根据俄国革命形势,认为俄国工人阶级有可能在西方工人阶级之前夺取政权,并得出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①,开始走向衰败。

列宁进而根据俄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和欧美资本主义强国统治力量相对稳固的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胜利的论点。又鉴于俄国专制的特点,他进一步突出强调了马克思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并相应地提出了建立由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政党,实行集中制原则和秘密工作等一系列加速革命进程的方法。正是在列宁这些思想原则的指导下,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更促使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坚定其以暴力革命方式改造整个世界的决心和信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疑使列宁深信,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爆发了,世界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成功地实现十月革命后,列宁更加确信,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的阶段。

在指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的基础上,列宁同马克思和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295 页。